

沈定平 著



“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

——明清之际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

WEIDA XIANGYU YU
DUIDENG JIAOLIANG

Ming-Qing Zhiji Zhong-Xi Maoyi he Wenhua Jiaoliu Yanjiu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

——明清之际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

沈定平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明清之际中西贸易和文化
交流研究 / 沈定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324 - 3

I. ①伟… II. ①沈… III. ①对外贸易—贸易史—研究—
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 ②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
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 IV. ① F752.94 ② 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821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

——明清之际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

沈定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324 - 3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640 × 960 1/16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5 1/2

定价：120.00 元

目 录

绪论	1
一、 新的视野和方法	7
用世界史的眼光加强明清史的研究	9
明清之际中国与西太平洋论纲	14
二、 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及其影响	41
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	43
明清之际几种欧洲仿制品的输出——兼论东南沿海外向型 经济的初步形成	65
关于中国商人在马来群岛发行货币铅钱的考察——明清之 际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一个实例	91
论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	114
明代南北方港口经济职能的比较研究	126
论明中叶后潮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145
论中国封建社会“强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原因	169
“强本抑末”与资本主义萌芽	182
“强本抑末”政策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189
三、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213
从西方学者的辩论看中西文化的同一性、差异性和互补性	215
“西学”的传播与中国的早期近代化	238

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欧启蒙运动的发展	268
16—17 世纪中国传教团与墨西哥教会的联系及其方法的 比较研究	293
基、释之争与明末“南京教案”	306
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	334
金尼阁——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坚定捍卫者	354
论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371
适应性策略的传承与卫匡国的历史贡献	398
瞿太素的家世、信仰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429
明末福建士大夫同传教士的交往氛围及群体特征	449
清初张尔岐的生平、学术趋向及其西学品味	509
马国贤在中国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雍正皇帝关系述论	534
西洋铜版画在清官廷的流传及其影响	557
西洋铜版画在乾隆官廷流传述论	584
康熙与路易十四时代——论中西在科学艺术领域的交流	609
从《崇祯历书》到《时宪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述论	647
明代中外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	665
 四、明史评论	67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明史的开创性著作	677
明朝覆亡历史与章太炎民族革命论	699

绪 论

明清之际,即 16 至 18 世纪,中国与欧洲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同时也是彼此在商业贸易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较大规模的直接交往的时期。中西之间这种史无前例的接触与交流,给世界历史进程和有关国家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及深远的影响。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Leibniz, 1646—1716),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近事》的“序言”中说,中国与欧洲这全人类最发达文明的民族携起手来,可“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他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进行深入比较后,得出结论:“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不分轩輊”,几乎是处于“对等的较量”中。^①而驰名西方汉学界的当代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Mungello),在近年出版的题为《1500—1800: 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的书中,则从“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被证实拥有影响世界大部地区的能力”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具体探讨了东西方之间双向影响与交流,及其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动态过程。并指出:“1500—1800 年的 3 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②

综合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即“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基本上揭示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质和特征。中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及其携手,足以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众多民族的生活方式,推动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中西方文明的“对等较量”,不仅反映在文明发展的程度上,彼此难分轩輊,唯有通过平等的交往互惠互利,

① 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 页。

② 孟德卫著,江文君等译:《1500—1800: 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 页。

而且在这交流、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动态过程中,实际上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特别是,正如我在另一部著作的序言中所说:“文化或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表现”。^①中国文化得以在同西方文化竞争中旗鼓相当,并且通过对西方的较强影响而呈现出一定的优势,固然跟优秀的中华文明丰富的内涵及其无远弗届的感染力,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的优势离不开明清之际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铺垫与支撑。

事实上,这种强大的经济力量,已经直接地介入中西交往的另一个宽广的领域。那就是在新形成的世界市场上,通过商业贸易的激烈竞争所展现的,无论是工业技艺,还是商品价格或销售范围,皆表明中国的生产发展水平较之欧洲要略胜一筹。在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的“竞争热”中,“中国是东南亚,老实说,也是遥远的国度的工厂。中国纺织品大量运往墨西哥,倾销于(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的市场”。^②并由此形成,中国与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的贸易,具有泛洲际的世界贸易性质;输出中国货物而流入白银货币,乃中欧贸易主要表现形式等特征。这样一来,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共同构成明清之际中西交往的那幅绚丽多彩且寓意深远的画卷。

有鉴于此,秉持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运用比较与综合、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透过世界市场的商品竞争和“对等较量”,揭示中国生产发展水平非但不落后于西方,而且在世界范围的商品供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地,论证中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和交流,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积极作用,指出就实际效果而言,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凡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于上述综合性、前沿性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科学的总结,不仅可以加强对中欧社会变革的历史规律的认识,而且通过展示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亦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故含寓一

①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增订本。

② 巴素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上册，台湾编译馆 1974 年版，初版绪论，第 11 页。

定的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此次出版的论文集,便是作者秉承上述宗旨,在该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汇编。这些收录的文章,大多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学术》、《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以及国内外重要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有的还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在国外刊登。至于少数暂未公开出版的长篇论文,或为近年赴香港、台湾参加学术会议而作,或是供学术演讲的文稿。

这三十一篇文章,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现简介如下。

一、新的视野和方法。对于如此宏大的课题,首要的,须具备广阔的视野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收录于该部分的第一篇文章,即发表于1984年5月9日《光明日报》的《用世界史的眼光加强明清史的研究》,这是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较早地倡导世界史的视野和综合的研究方法。该文结合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以及明清史悬而未决的问题,指出世界史视野和综合考察中西关系的重要性。第二篇文章,乃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从树立正确的海洋历史观出发,概述历史上中国与西太平洋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海权、移民等多层次多侧面的联络,形成利益交融休戚攸关的牢固的纽带。于是,明清之际,出乎入侵该海域的西方殖民者的意料,他们在该地区的活动,不是削弱而是助长了中国商业贸易的发展,不是阻止而是扩大了中国移民的机会。再次印证具有广阔视野和综合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二、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及其影响。收入该部分的九篇论文,包括两项内容。其一,通过对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关系基本特征的考察,证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因处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交汇地带,为它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世界市场上一些主要商品(棉布、丝织品、铁器、陶瓷制品)的竞争情况表明,在欧洲发生产业革命并取得显著成效之前,中国生产发展水平非但不落后于西方,还在某些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举凡对天鹅绒、锦缎、丝裙、火炮、洋彩瓷等若干欧洲产品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引进、仿制和大量输出过程的揭示,说明在该地

区出现了以出口为目的的外向型经济网络的雏形。尤其是,对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福建商人在东南亚发行低值货币铅钱的研究,阐明中国商业势力对东南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其二,通过诠释中国传统的“强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政策的历史源流及其表现形态,特别是与风靡西欧的重商主义政策相比较中,指出其危害性在于,破坏工农商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打断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过程,阻遏海外贸易对国内生产的促进作用,凡此说明,这种传统思想和政策,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迟滞的重要根源之一。

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收入该部分的十八篇文章,可再分为三个专题。

第一,为驳议西方学者的观点,回顾了二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践,并论证在科学、道德和宗教领域交流的过程中,中西之间既存在文化差异性,亦存在文化互补性的诉求,这是通过交流彼此获益而社会进步的基因之一。随后,从中西两个方面,探索“西学”的传播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联系,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前者如开阔进步思想家的视野,寻求拯救社会危机和实行改革的新的学术基础,成为汇入并推动经世“实学”思潮的一股力量。后者如中国这个非基督教世界的人类优秀文明的存在,动摇了基督创世的陈说并打破了欧洲文化至上的偏见,从而来自中国的古代文明,乃西欧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料的重要源泉。再次,通过对利玛窦适应性策略内外因素的考察,说明其形成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内部,它是同基督教会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实行的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紧密结合的路线划清界限,并与其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在外部,它的发展面临着中国强大的儒家保守派和佛教势力的排拒、阻遏乃至公开的迫害。由于内外势力的交互作用,适应策略经常处于危难蹙蹙之中。

第二,选择中西文化交流中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或群体,如西方的马可·波罗、利玛窦、金尼阁和卫匡国,中方的徐光启、瞿太素与明末福建士大夫群体,对于彼此的交往、传承和贡献,进行了具体的较为深入的剖析。鉴于清初思想家与西学的关系,乃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特

撰文表彰僻处村野的明末遗民张尔岐的忧患意识、用世精神及学术成就,同时首次论述其不同凡响的西学观。

第三,展示清代中西方在科学艺术领域的交流。如回顾清朝康熙皇帝与法国路易十四国王之间频繁的友好交往,他们在提升中法科学艺术过程中,留下的回味无穷的历史佳话。勾勒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受到的恩宠。系统地论述西洋铜版画在中国社会和明清宫廷的流传,诸如热河风景画、《皇舆全览图》、《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圆明园西洋楼等铜版画精品的成就,皆是中西艺术交融的典范。通过明末《崇祯历书》到清初《时宪历》的演变,追寻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轨迹,指出开明进取的政治诉求,与可验证的先进历法科学性的结合,乃是推动这种演变的强大力量。

四、明史评论。该部分精选的两篇文章,试图从更大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多方位的审视、评估和推动当今国内的明史研究。第一篇,在评鹭《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的特点、基本线索及其得失过程中,既肯定西方学者考察中国历史独特的视野、方法和论述,尽可收借“他山之石”启人心智之效。同时指出,那种刻意淡化明朝政权的阶级属性,将中央政权和地方少数民族视为国与国关系的观点,则不足为训。第二篇,通过阐释明朝覆亡历史跟辛亥革命理论家章太炎标举民族革命论之间的联系,追溯在其形成过程中,明朝覆亡历史的影响,及其深刻反思和理论升华,已经成为构筑该体系的重要的思想资源。由此明史认识与近代历史走向之间的关联,彰显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感召力。

最后,在本书出版过程中,须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出版基金的支持,及商务印书馆丁波、刘翔先生的帮助。

作者于北京望京上京家园

2014年12月28日

一、新的视野和方法

用世界史的眼光加强明清史的研究^①

当前史学的趋向之一,是越来越重视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对于明清史研究者来说,具有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尤其显得重要。如果我们不是从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把握明清时代的特点,不注意当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及其相互影响,那么要全面地反映历史实际,开创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都将是比较困难的。

明清时代与世界发展趋势

16至18世纪,正是世界历史上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渐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界限,日益具有世界性。大量事实表明,明清时代的中国与处于巨大变动中的世界,有着愈来愈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已经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第一,无论封建统治者如何闭关自守,明清的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由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引起的“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的丝货(生丝和丝织品)、棉布、瓷器、铁器、茶及其他农副产品,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形式以及毗邻国家狭小市场的限制,成为在新开辟的世界市场上颇具竞争能力的商品。

^①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1984年5月9日,史学版。

中国商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引起的一个巨大变化,即在于通过各种贸易渠道,使原产于拉丁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入中国。据中外学者估计,从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的72年间(1573—1644),各国输入我国的银元在1亿元以上。从康熙后期到乾隆后期的一个世纪中,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3.5亿两。

中国货物的大量输出和巨额白银的流入,总的来说,是有利于国内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例如,外来的数以亿计的白银为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不断扩大的海外贸易,则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产品,以及江南和东南沿海的商品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至于贵重金属的大量涌入,使明清物价呈现出上涨的趋势,这种趋势与西欧的情形一样,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二,中国与欧洲这两种具有不同风格和传统的思想文化,正经历着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直接交流过程,它既有助于中国科学技术和“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发展,也对西欧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和科技领域,正处于变革时期。传统的“空言心性”的理学,逐渐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所取代。与此相适应,相当一批对中国古典科学成就进行历史性总结的著作和科学家联袂而出。这时候,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可谓适逢其时。中国有识之士倡导“西学”的目的,在于“从事西教,思窥其象数之学,以救汉宋以来空言论学之失”^①。于是当时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物理小识》等,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西方科技的成果。而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李颀等著名思想家,“在某些论点上表现出一种打破民族片面性和偏狭性的新思潮”,也“是在中国和西洋文明交接之后才产生的”^②。

至于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欧历史进程的伟大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它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有利的思想武器。启蒙

① 黄节:《徐光启传》。

②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28—29页。

思想家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及其学说，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

第三，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侵略和掠夺活动，面临这种不断增长的威胁，封建统治者更加严格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其后果是越来越跟不上世界历史的前进步伐，终于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对外关系方面，大体上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不过，到了明朝后期的数十年间，已经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明朝于隆庆元年（1567）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东、西洋贸易。虽然各种限制的条例依然存在，但大多形同具文。与此同时，对于知识阶层同西方文明的接触，并没采取强烈压制办法。崇祯皇帝甚至出面批驳道学家刘宗周，主张引进西方的火器。如此一来，明末的知识阶层曾一度掀起一股学习西方科学的热潮。

可是，由于西方殖民者侵略活动的加剧，以及清朝统治者偏执狭隘的心理作祟，清朝并没有沿着明末松动的方向发展，而是变本加厉地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事实表明，凡属资本主义萌芽部门所生产的、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商品，均是重点限制出口的对象。只要是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一概进呈“御览”，封锁于“内府”，不让知识阶层接触和了解。此外，清朝还大肆提倡理学与频兴文字狱，双管齐下，使一度活跃的进步思潮遭到无情的压抑和扭曲。乍看起来，清朝的禁锢政策颇为得计，殊不知这正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史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视野

欲全面地反映明清社会的历史实际，必须联系世界历史进程，考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同样地，为了提高明清史研究的水平，也需要具有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

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阐述 16 至 18

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充分揭示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明清史研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具体内容。可是，对于这样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即或有人谈到这段历史，也大多偏重于“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于中国古代文明在西方的传播情况，则往往无人问津。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要比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强大得多。如果我们全面地研究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用马克思主义对它进行科学的总结，就不难发现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特点，只有通过互相学习和交流才能共同进步，这是历史的规律；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澄清某些同志盲目崇拜西方文化、鄙薄中国古代文明的模糊认识。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是近年来史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明清时代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变为落后的转折阶段，而且是封建主义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反映得最充分，新旧事物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最激烈。因此，加强明清史研究，对于深入探索中国历史上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封建社会的长短以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快慢，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倘若离开了对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进行比较这个历史前提，那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认为，近来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在方法论上尚有改进的余地。即它们大多是就中国封建社会的某种因素，来谈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而不是在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视野内，从中国与欧洲或日本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去发掘阻碍中国封建社会迅速发展的各种因素，因而这种研究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明清时代与同时期的西欧或日本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认真的考察比较之后，那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认识，相信要比现在深刻得多。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是明清史领域令人瞩目